

GUILIN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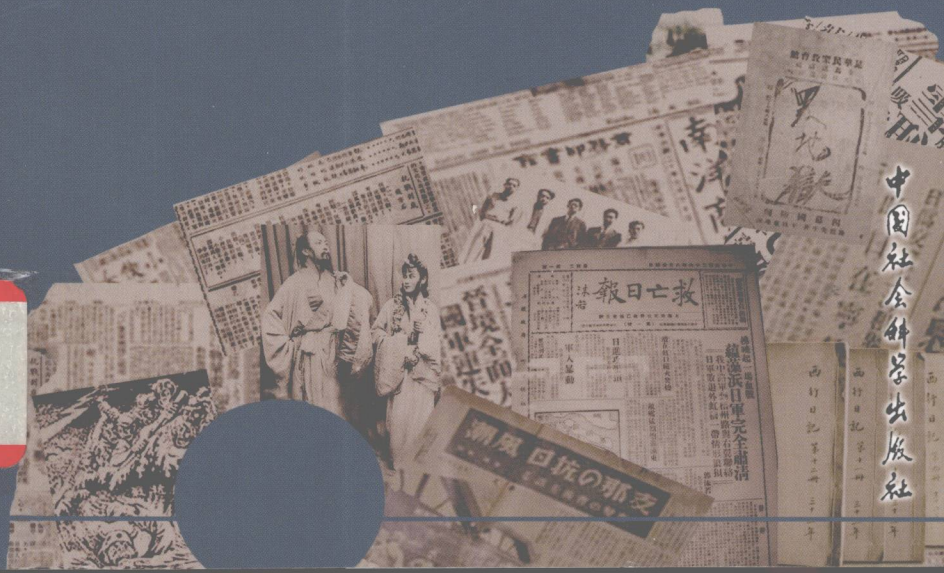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作家研究

GUILIN WENHUACHENG
ZUOJIA YANJIU

主編 黃偉林 副主編 高蔚

6
07
10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GUILIN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作家研究

GUILIN WENHUACHENG
ZUOJIA YANJIU

主编 黄伟林 副主编 高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黄伟林主编、高蔚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004-6807-3

I. 桂… II. ①黄…②高… III. 作家—人物研究—桂林市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2042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崔注中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 黄伟林



副主编 高蔚

主编黄伟林：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武汉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孔子的魅力》、《转型的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等专著，曾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

副主编高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另有专著《纯诗的中国化研究》。

目 录

导论 不曾屈辱过一次

- 《桂林文化城文人生态研究》导论…………… (1)
- 一 城市记忆:岁月沧桑堪回首…………… (1)
- 二 文人心态:渗透着苦难与奋争的激流…………… (25)

第一章 凄苦邂逅 诗意漂泊

- 艾芜“桂林时期”的生活及创作…………… (51)
- 一 桂林:乱世中的邂逅…………… (52)
- 二 在桂林:没有硝烟的烽火岁月…………… (54)
- 三 匆忙的别离…………… (64)
- 四 桂林时期的创作述评…………… (67)

第二章 迷失在“现实”中

- 王鲁彦的桂林“战场”…………… (81)
- 一 “不能飞山过海”,生命“愈觉战慄”…………… (83)
- 二 生活是“战场”…………… (86)
- 三 理想与天真的挫败…………… (94)
- 四 迷失在“现实”中…………… (102)

第三章 抗战中的沉郁剧魂

- 欧阳予倩的烽火桂林…………… (113)
- 一 风雨如晦——去沪来桂之因缘…………… (114)
- 二 桂林之旅——抗战时期的艺术人生…………… (117)
- 三 改革与创作——烽火中的文化贡献…………… (131)

第四章 “沉默”中的坚守

- 巴金桂林时期的“三进山城”…………… (157)
- 一 避难桂林…………… (157)
- 二 重返桂林…………… (164)
- 三 三进桂林…………… (174)
- 四 桂林时期的创作…………… (185)

第五章 南国人间啼笑寂,鸡鸣风雨寸心知

- 茅盾的桂林春秋…………… (202)
- 一 桂林春秋…………… (202)
- 二 烽火中,不屈…………… (209)
- 三 疾书奋笔谱新篇…………… (213)

第六章 激情回荡的岁月

- 艾青在桂林…………… (226)
- 一 过渡的驿站…………… (226)
- 二 流金岁月…………… (228)
-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 (242)

四 桂林时期的创作·····	(246)
----------------	-------

第七章 战士与诗人

——桂林文化城里的胡风·····	(268)
一 “天正长,路正长,工作永远无休止”·····	(268)
二 在由混乱而“凸显出的鲜血淋漓的斗争” 中“昂首阔步”·····	(280)
三 战士与诗人: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	(290)

第八章 山水桂林得暂息

——陈寅恪先生抗战期间广西大学的 授业生涯·····	(304)
一 典衣卖物离港赴桂·····	(304)
二 躬亲提水劈柴 从容析疑论学·····	(308)
三 笔耕不辍出精论·····	(320)
后 记·····	(324)

导 论

不曾屈辱过一次

——《桂林文化城文人生态研究》导论

一 城市记忆：岁月沧桑堪回首

历史上，桂林处于荆楚之地与百越之地的交汇处，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结合部，也是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杂接地。奇特的山、秀丽的水，是它特有的标志，挺拔峻峭的孤峰、精彩出奇的岩洞、倒影清澈的漓江，曾如神话中的仙境一般，令人神往。即便在 1937 年的卢沟桥烽火点燃时，偏于西南一隅的桂林也不过一个只有七八万人口的小城，除了闻名于世的山水风景，并无其他显赫之处。然而，从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开始，桂林却因特殊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原因而成为一座特殊之城。一时间，大量的文化名人云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周立波、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及著名学者大约 1000 多人先后进入桂林。文化名人的汇集给这座小城披上了耀目的星辉，也带来长达数十个月的喧嚣。这些文化艺术界的精英，一边为战火所迫避难桂林，一边利用桂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喘息、休整、写作、

教书，他们要保存实力，以备国家民族的不时之需。

此时的桂林，人口骤然增至近 70 万，她已远不是那座以山水风景名闻天下的寂静小城。桂系军阀的军事控制，桂系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这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文化人士能够在这种法则的“文化场”中较为自由地活动。据统计，当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书籍和报纸杂志，占全国发行总量的 2/3 以上，许多重要作品大都是在这里创作成篇的，许多重要的剧作也是在这里得以公开发表并首次上演的。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 80% 是桂林出版的。其间，各种文化团体的活动盛况空前。1944 年 2—5 月举办的西南五省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更是吸引了南方五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它演出的剧目有 126 个之多，不仅将此次文化活动推向高潮，制造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影响远至海外，而且也铸就了“桂林文化城”的标志性活动。与此同时，物价高涨，洛阳纸贵，一些进步书刊出版艰难，也是她的衍生物。或许可以说，历史上罕见的“桂林文化城”盛景，是因政治、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所致。

作为严格意义命名的“桂林文化城”，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沦陷，到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第二阶段为从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到同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三阶段为从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4 年下半年湘桂大撤退。每一次动荡的发生，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来说，都意味着他们被抛出原有的生活轨道，意味着新的苦难的降临。“漓江江上月，几度照沉浮！”欧阳予倩的这两句诗，颇能代表流亡桂林的大多数文人当时沉郁的心境和对现实的感慨。独特的境遇遭际造就了作家们独特的心态，催生了他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也掀动了“桂林

文化城”滚烫的救亡情感。“民族救亡”，这个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关切的问题，也成为大后方文化聚集之城——“桂林文化城”文化宣传的主要特征。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渗透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中，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作家们的创作，既结合了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融会了个人对社会与民族的思考，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涵盖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文学信仰、审美情感和个人情怀。“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艾青的诗句凝练地概括了1938—1944年“桂林文化城”时期的城市往事和文人心态。

转眼之间，“桂林文化城”已是70年前的往事，当年由喧哗、热闹与苦难交织的历史碎片，已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回首那些或辉煌或萧瑟的陈年旧事，将有助于今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岁月的沧桑。

（一）重绘“桂林文化城”

1938年的桂林，漓江依然从北向南流去，这个山水甲天下的小城被划开东西两片。西片的明王城遗址仍是市中心，由于战事的发展，人口的激增，新建的房屋星罗棋布；东片的城区有一条漓江的小支流经七星岩前，穿过古老的建筑物——花桥，再向南回流入漓江，新增建的双层小木楼如雨后天春笋般布落于东城郊区的路旁和溪流边。纷飞的战火，逃亡的人群，这个曾经是世外桃源的小城充斥着喧哗与骚动。司马文森回忆1939年他初到桂林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的，它的声望似乎与我们想象不相称，是个内地中等城市，只有两条较大街道，街道挤迫，房屋陈旧破烂，并没有省会气魄。但当时的人很多，满街是人，而且是来自各方面的，有上海口音的，有湖南口音的，有广东口音的，也有北方口音的。这些人都是从各地逃难的，有人路过，

有人暂时住下，看看再说。由于人口迅速增加，需要吃住，因此各种‘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旅店、饭店、故衣店和地摊随处可见。而在市郊外简陋的木屋也大量兴建，但顶费租金也不低，很多人利用机会大发国难财！”^① 1944年11月，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可爱的桂林》在桂林上演，剧中的一段对话也形象地再现了当年“桂林文化城”的景况。戏的开始，甲与丙邂逅，甲向丙诉说桂林正在疏散，丙原本正要去桂林游览，并打算在那里找工作，听到此消息大惑不解地问：“这么好的一个城市，难道要放弃么？”接下来的对话中，甲向丙细数了桂林的可爱之处：“可爱的桂林！她是西南居领导地位的文化城。有清奇挺拔的山水，淳朴坚实的民情，有刻苦自励的领导者，有成千成万的文化斗士；有许多新兴的工厂、生产机构、印刷业和出版界……有‘南天一柱’的独秀峰，马肉米粉，七星岩，桂林三宝：马蹄、豆腐乳、小金凤，还有八十多种杂志、四张大报、三张晚报、图书馆、艺术馆，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电影、诗歌朗诵，又有空前盛况的‘西南剧展’……全中国的人没有哪一个会不关心桂林的得失……”^② 对于这个为全中国人牵系的桂林，当时，它空前兴盛的莫过于书店和新闻出版业。

刚刚亮起来的街灯和快要灭尽的白日光线给我指路。迎面走过来的两三个撑伞的行人。我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我走过中华书局，我看不见非常的景象。但是过了新知书店再往前走……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

①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

② 欧阳予倩：《可爱的桂林》（独幕剧），载1944年11月3、4、5日《广西日报》昭平版。

店不见了?^①

也许,你会以为这段话是在描述上海或北京的街头,然而,这实际上是1939年巴金所走过的桂林街头。抗战前,桂林仅有几家书店,抗战爆发后,因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而蜂拥至桂林的文化团体、学者、作家,迅速使桂林的出版、书店、报业空前兴盛,而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等各大书店也因战事相继迁来桂林,有资料记载:“离中南路不远的桂西路,书店更为集中了。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新华日报》图书课都设在这里。还有规模较大的书店如上海杂志公司、大时代书局等,书店林立,形成了一条文化街。”^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1944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有180余家^③。对此,丽尼在文章中感慨道:“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④

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印刷业也得以繁荣。抗战前,桂林印刷业大小不过30家,大部分是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刷书版的印刷厂,全市的印刷工人不足300人,资金总额不足30万元。文化城时期,印刷业空前兴盛,据1943年7月份的资料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有8家,书版兼彩印的6家,书版兼杂件的12家,彩印的5家,铸字的2家,装订的3家。设备方面齐全,每月生产用纸达到

① 巴金:《桂林的微雨》,载《巴金全集》第11卷《旅途通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③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④ 《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载桂林《克敌周刊》第23期。

10000—15000 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 3000 万字到 4000 万字^①。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行情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有资料显示：“整个抗战期间，在桂林共出版了 200 余种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各类图书的出版，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 20 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约近期内 10000 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 7000 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 20000 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 5000 为单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可观的。”^②因而有人给出了这样的断语：“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是没有问题的。”^③

“桂林文化城”的新闻报纸和杂志大多数由进步文化人士主办，他们坚持抗日立场，彼此团结，很好地支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也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报章杂志的众多园地为青年作家们提供了抒发情怀的地方，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例如，以“鲁迅风”杂文为特色的《野草》杂志的发行，就紧密结合时代命运，培养出秦似等一批优秀的杂文家。这时，报纸也由原来的《广西日报》一家，猛增到 21 家，《新华日报》、《力报》、《大公报》、《救亡日报》、《扫荡报》等相继迁入桂林，这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④。

文化事业的蓬勃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发展，尽管战时的教育设置，难以用正常、完美的教育模式去规范、规划，但是，昔日的

① 洗文：《桂林市的印刷工业》，载 1943 年 9 月《中国工业》第 19 期。

② 魏华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上，漓江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

③ 转引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④ 同上。

广西大学和广西师专，依然为“文化城”另一文化景观的构成，储备了相应的精神力量。

在今日的桂林南郊雁山脚下有一处风景独胜处——雁山公园。这里曾是清代两广总督的别墅，园内亭台楼阁古雅，有相思江环绕，百龄以上的相思树立于园内的红豆院旁，整个园内青山环抱，碧水中流，池沼岩洞掩映其间，颇有大观园的韵味。在20世纪民族危难、个人生命流徙的三四十年代，这里是昔日的广西大学和广西师专的校园所在地，它那秀美的山水，给任教于此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们提供了身心的栖息地，使流亡于桂林的文人们能够沉潜于文化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承担为民族命运抗战的重任。

1932年年初，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筹建，唐现之任师专筹办处主任，这是一位服膺陶行知教育主张的教育家。他主张培养青年，改造社会，但他不赞成学生过问政治。他认为，读书有学问，学会生产技术，出来从事农村教育，才能救中国。因此，他选定雁山脚下的这个名园，想利用园内外土地，让学生多学习农业生产。这位主张教育救国的教育家，在任职的几个里，和师生们一起唱着“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起野草好长苗呀，依呀嗨，呀嗨……”伴随着那充满活力的“锄草歌”，清理校园，开荒种菜，企图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战时教育园地。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田园式教育理想，在民族危机重重的当时，显然难以实现，所以，到1932年的10月，杨东莼任校长时，师专的教育被重新注入了政治感和现实感。杨东莼的教育方针是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加入了新兴社会科学的课程，与此同时，他也建立了一支思想上比较激进的教师队伍。至抗战前，广西师专先后聘请来的老师和知名人士有陈望道、薛暮桥、马哲民、邓初明、朱笃一、施复亮、沈西苓、杨

潮、夏征农等人。自此，青山绿水的雁山脚下透出了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其中有两个方面最值得一提，一个是创办校刊《月牙》和《普罗米修斯》壁报。师生们以此为阵地，讨论国内外形势、中日关系、救亡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文化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他们讨论的话题常常既尖锐又敏感，因而，有不少内容在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陈望道提议编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专刊》，就引起了校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一位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后，回去用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这使学校的影响转瞬之间就超出了省界和国界^①。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师专剧团的话剧公演。在沈西苓、陈望道等人的努力下，师生们先后演出了《父归》、《屏风后》、《怒吼吧！中国》、《钦差大臣》等具有时代气息的话剧，这几场演出轰动了桂林，一向沉迷于桂剧的桂林观众耳目一新，他们被这些剧作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深深吸引了。尽管1936年时，桂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将广西师专并入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师专走向了结束，但30年代广西师专那已具规模的美丽校园，那关注民族安危的校园氛围以及它精心培养出来的爱国忧民的学生，都是“文化城”精神气质的潜在阶段，它存在于“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前夕，其意义是举足轻重的。

1928年，广西大学在广西梧州蝴蝶山成立，马君武任校长，这是广西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成立时正值战云密布，国难当头之时。马君武从“学点什么本领去收复失地，去复兴中华民族”的理念出发，确立了三项教育目标，他要让学生学习：（1）科学知识；（2）工作的技术；（3）战斗的本领。以此达到救

^①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十年代广西师专》，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国的大目的。鉴于这样的考虑，他号召广西大学学生团结起来，拿书本、拿锄头、拿枪炮，去救中国，救民族。虽然马君武曾一度离任，但广西大学在他手中形成的“保卫中华、发达广西、为国牺牲、为民工作”的校训，却一直保持着。1939年，广西大学被定为国立大学，学校全部迁入桂林雁山，马君武再度上任。任中，他先后聘请了竺可桢、李四光、李达、陈望道、王力、刘仙洲、陈寅恪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来校执教。当时正逢“桂林文化城”的兴盛阶段，各地学者专家聚集桂林，马君武更是不肯坐失良机，经常敦请他们来校作学术演讲，这极大地促成了广西大学研究学术的浓厚风气。校园内一年四季相思江流水悠悠，夏季亭台楼阁四周的湖面上水浮莲粉粉绿绿，秋季满园的丹桂飘香，红豆院的相思树挂满了殷红的相思豆。这样相对宁静优美的环境，令战乱中的文人们精神上得到了不少安慰和滋养。1942年，吴宓答陈寅恪的绝句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灵光历劫孤峰秀，沧海横流万类哀。

山水桂林得暂息，相依我正向黔来^①。

（二）曾经的文化盛事

桂林文化城时期，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有新闻出版工作者，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工作者，不一而足，这是文化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当年的文化盛事真是说之不尽。美术方面的木刻运动、漫画运动在当时都盛极一时，一批画界大师，如徐悲鸿、丰子恺、廖冰兄、尹瘦石、关山月、阳太阳等，他们作出了

^①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许多优秀的画卷。徐悲鸿在桂林创作了《鸡鸣不已》、《青厄渡》、《漓江春雨》等名篇；漫画大师丰子恺的《抗战漫画集》，木刻大师黄新波的《香港受难》和《夜萤》也都相继问世。音乐方面，张曙、林路、满谦子等音乐家先后创办了《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知识》、《每月新歌选》等音乐刊物，并组织了多个合唱团的演出。戏剧方面，桂剧改革和西南戏剧展轰动一时。文学上的收获更是丰厚，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桂林创作的，如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三部，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诗论》等。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城”历史盛事中的珍宝。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应该是继承鲁迅杂文艺术风格而执拗地面对“敌人的鼻梁”的《野草》杂志同人的活动。

鲁迅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中国青年）所钟爱，鲁迅的杂文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它总是对正在进行（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包括文学）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产生影响的^①。鲁迅逝世后，这种“鲁迅风”的杂文风格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抗战以后为民族命运苦战的主要文体之一。抗战后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杂文团体，桂林的《野草》月刊以及围绕该刊所形成的以夏衍、聂绀弩、秦似、孟超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上海“孤岛”时期的《鲁迅风》同人，主要作家有唐弢、柯灵、徐懋庸、王任叔、周木斋等人）。

《野草》于1940年8月20日在桂林创刊，由桂林科学书店发行创刊号。秦似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叙述了《野草》的成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